

【歷史教室】

◎邱淑雯

民眾史的思想與建構： 以日本地域史的 編纂為例

柳田國男的 民俗學研究

談及日本民眾史的思想，必須追溯到民俗學大師——柳田國男（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年）。他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學者，出身於兵庫縣神東郡田原村辻川（現為神崎郡福崎町辻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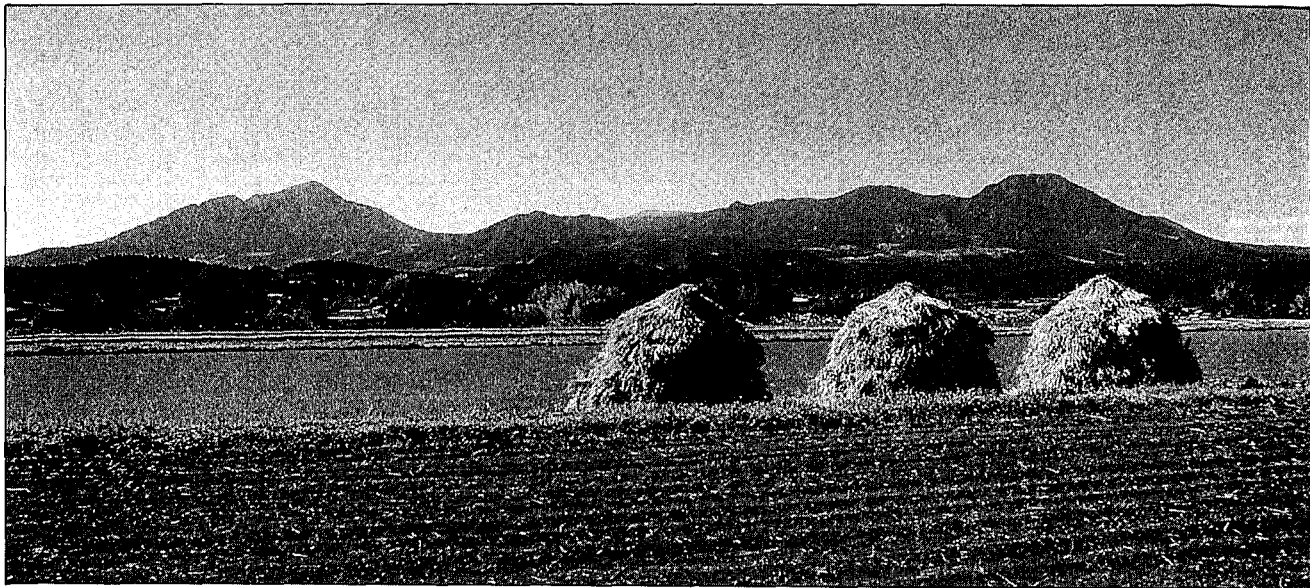
柳田國男民俗學研究的開端可回溯到一九〇八年的夏天，當時他在九州旅行中驚豔地觸及到擁有「數百年前身影」以及

社會雖然由民眾所組成，但長期以來多認為民眾沒有歷史，也無法創造歷史，民眾史的研究長期受到漠視。然而民眾的生活經驗，本身就是歷史的一環，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以日本的自治體史、學童疎開誌、地域女性史這三方面，說明民眾史的思想與建構。特別是庶民的觀點，如何在編纂過程中受到重視；以及民眾如何參與歷史的編纂，開拓歷史的新領域。

「純日本思想」的村民之生活實態，在訪談宮崎縣椎葉村村民的狩獵方法後，寫下了著名的民俗學誌《後狩詞記》。同年年天，柳田國男在東北岩手縣遠野一帶記錄了當地的口傳事跡，並於一九一〇年發表《遠野物語》和《石神問答》，奠定了他在日本民俗學研究的基礎。一九三五年，他發起「日本民間傳承學會」發行《民間傳承》雜誌，這是柳田國男組織全國有志一同學者的起步，隨後以「木曜會」成員為中心展開全國性的民俗調查，陸續發表關於山村、漁村、離島、南島的民俗學研

究報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柳田國男對於日本人的基層信仰產生興趣，先後完成了《先祖の話》以及《祭日考》、《山宮考》、《氏神と氏子》新國學談三部作品，透過對於祖先崇拜、民間信仰、氏神、祭祀慶典等研究，把民俗學定位在經世濟民的學問。戰後，他延續之前對於沖繩研究的熱忱，提出日本人源流是從海上而來的大膽假說，發掘日本人與稻作文化之間關係，於一九六一年完成《海上之道》的最後巨作。

柳田國男在其民俗學漫長的生涯中，



九州地區的田園風景。

提出了許多有關民衆史研究的精湛觀點，這些觀點可以做爲民衆史的思想源流之一。他認爲民俗學是對於同文同種的我族進行「自我反省、自我審察」的一門學問，其畢生職志就是透過民俗學研究，去瞭解日本人獨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柳田國男將民俗學研究中的日本人鎖定於「常民」(folk)。常民是日本民俗學極爲重要的概念，它是指具有古風的下層民衆，是保持、傳承民俗的主體。常民對於新文化的接受較爲緩慢，是屬於傳承文化的所有者，日文的傳承就是指傳遞「受容文化」(accepted culture)的過程。常民的文化不是藉由「文字」來傳承，主要是透過「口傳」及「行爲」來傳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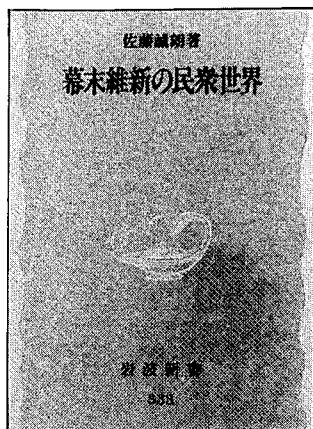
若以二分法區分，柳田國男認爲所謂的教養者通常具備「反省的、論理的、創造的、進步的」特質。相對於此，常民則傾向於「反射的、聯想的、模仿的、保守的」天性，日本民俗學的任務並非去觀照少數不世出的天才，而是去研究農漁山村共同體(community)中的多數凡夫。民俗學傾向處理和平時代的、可重複的、日常生活的普遍事跡，記錄「沒有(被)記錄的」常民之歷史。但隨著階級快速的流動，常民此一概念已無法用固定階級來指稱，不論是上層階級或下層階級。因此常民的定義轉而強調「生活的日常部分」，從「常之民」過渡到「民之常」。柳田國

男的研究特色在於：從常民的生活文化之具體面貌展開綿密的分析，因此他的常民生活採集至少有三個項目：一是可視的有形文化，像外在的事物與行爲。二是可聽的口承文藝，譬如語言。三是心意現象，包括感情、觀念、信仰、知識、生活目的與生活技術，特別是透過一般百姓對於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變遷的「感覺與意識」，去掌握每個時代獨特的風貌。

早期的柳田國男並非以水田稻作或定居農業之人口爲主要研究對象，而是對於從事狩獵與燒耕的「山人」，或是移動於山野林地、專門製造木雕或木製用品的「職人」等之文化抱持更濃厚的興趣。要到一九二〇年代之後，柳田國男才逐漸朝「定居平原地帶的普通農民」這方面去研究，特別是封建制度底下占多數的農民。譬如，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日本社會籠罩在慢性經濟不景氣的風暴之中，柳田國男從「爲何農民會一貧如洗」出發，希望將民俗學重新定位於「具有高度社會實踐與解決社會問題」的一門學問。

色川大吉的 民衆史研究

色川大吉是日本研究民衆史極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他研究日本近代史和思想



《幕末維新的民衆世界》，介紹當時民衆的生活概況。

史，特別是民衆的思想史，主要著作包括《近代國家の出發》、《明治の文化》等《歷史の方法》、《日本人の再發現》等。色川大吉出生於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日本史，當時國史學科的教授特別向學生言明以下兩點：不要研究明治時代（一八六八年—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近代」以後的歷史，因為爭議性太大。也不要研究「民衆史」，因為民衆沒有歷史，也從未創造過歷史。出身於小農商人家庭的色川大吉，對這種貶抑民衆的史觀自然無法苟同，但在學期間只好無奈地選擇日本古代史做為研究的題材。

色川大吉提出研究民衆史的三個重點：一是民衆的生活原理到底為何？二是當代的支配思想如何支配廣大的民衆？三是民衆如何打破這些支配的思想。與色川大吉對話的另一歷史學者布川清司也提到研究民衆史的幾個要項，他強調必須還原「被否定的民衆」之原形。好比爲了凸顯明治維新的正統與合法，長久以來，江戶

時代（一六〇三年—一八六八年）的民衆常居於被否定的地位，他們的生活與意識總被認爲是過時而傳統的，而這些陳腐的思想正是明治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阻力來源。因此，對於江戶時代民衆的再發現、再評價成爲日本研究近代民衆史的重要議題之一。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席捲全球的現代化理論對於民衆文化多以「病理」視之，認爲那些都是阻礙現代化進程的遺毒必須加以鏟除。面對民衆價值的極端否定，鼓吹民衆的自我改造與自主自立，成了對抗現代化浪潮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民衆與社會歷史進程的接合方式爲何？民衆行動與民衆意識又是什麼？民衆思想與民衆生活的關聯等等，也都是民衆研究的焦點。

係中討論民衆的思想意識。即便對於民衆的生活開始予以關心，許多學者仍傾向把它視爲國家體制內被宰制的一部分，而不會以民衆生活爲基點，去反思民衆如何對抗來自國家社會的制約。色川大吉強調必須同時從民衆的立場以及從歷史的實感出發，打破以國家天下爲尊的歷史學，轉向以民衆生活爲重的歷史學。

然而，很少有人會觸碰到民衆這個階層的精神結構，民衆的思想史研究即便開始受到重視，卻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盲點。許多研究民衆思想史的學者強調：民衆的通俗道德，像勤勉、儉省、謙讓等德行如何被支配、利用、收編，而成天皇制忠君愛國、甚至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重視國家對於民衆的宰制與馴化，卻忽略了民衆反抗這些忠君愛國思想的自主與可能。日本戰前馬克斯史學雖針對民衆的「革命潛能」予以高度關注，但對於民衆的「生活狀況」卻少有觸及，它還是在「國家 vs. 民衆」的「支配 vs. 被支配」關

民衆史研究的過程裡，「地域史」是經常提及的範疇，其中「歷史的想像力」成爲該研究的基本要求。鄉土史家通常是「住在該地的人」，而研究地域史的學者有不少是「從外部進入的人」，外來者的眼神通常只會先掌握該地的外像景觀，包括產業景觀和自然景觀，日久之後觀察的焦點才擴及在地人的血緣集團和心象世界。色川大吉本身曾爲了研究「三多摩」地區的歷史發展，特地搬進該地住了長達十一年之久，但發現他自己所認識的三多摩仍相當狹隘。體會到外來者認識當地文化的極限，色川大吉鼓勵由當地人自己寫自分史（*zibunshi*），它是庶民自我認識的記錄，強調個人與社會、土地、生活世界的緊密連接，尊重土地與人的自主性與主體性，其終極關懷是：讓這片土地會更好，也讓這裡的人會更好。相對於柳田國男早期民俗學中欠缺政治性的觀點，表達的只是對於過往的、田野的、牧歌式的庶民生活之嚮往，色川大吉極力主張地域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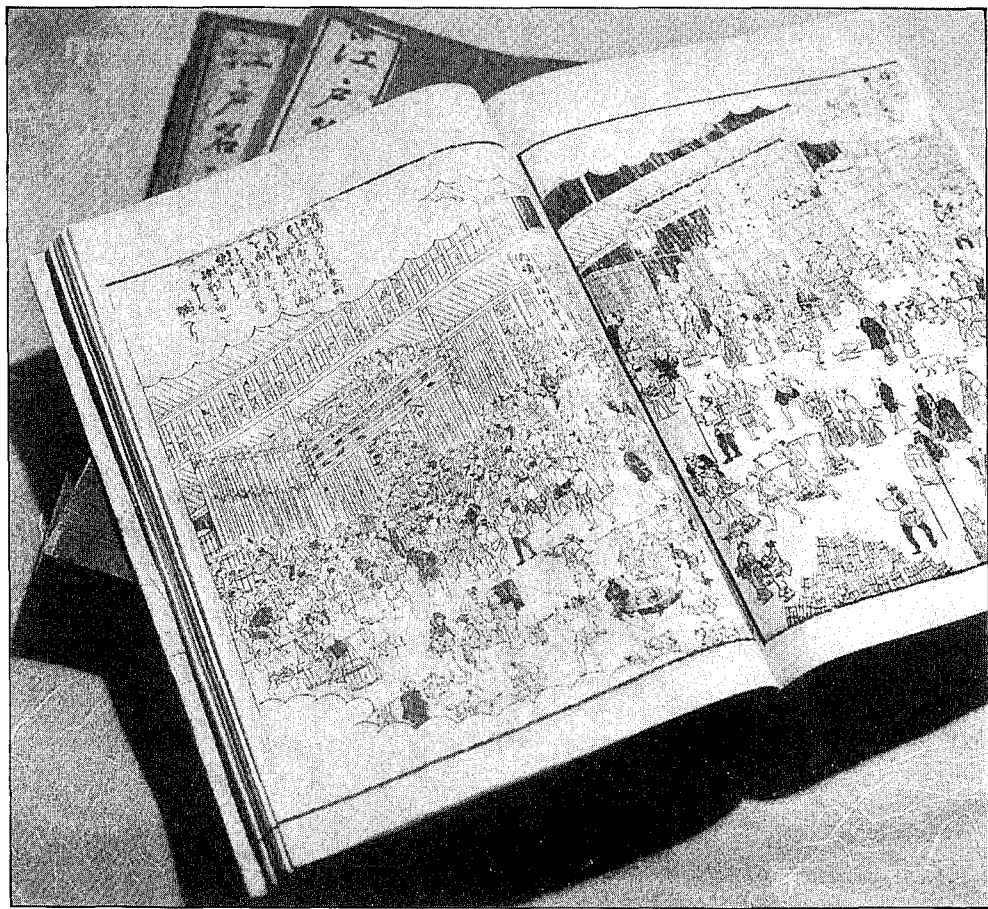
研究應同時包括生活史當中的「衣食住行、社會關係，以及政治性」，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自治體史的編纂

日文的「自治體」是指具有自治權能的公團體，都、道、府、縣、市、町、村等行政單位屬之，自治體史通常是由自治體委託學者或民間人士編纂，發行關於「其行政領域內的歷史記錄」。日本自治體史的前史可以追溯到奈良時代公元七一三年的《風土記》，但之後因行政領土的劃分不夠明確，類似《風土記》的地域誌並不完整，直到幕府武家政權的成立（一九二二年），才引發統治者對於支配領地的關心，由統治者下令編纂的地域誌也才開始盛行。十五世紀之後，莊園制度解體，鄉村制起而代之，也出現庶民自己所寫的地域誌，它是透過每年祭祀集會的場地，村人們結集記錄村內發生的重要事情，是一種集體協商後的文字記錄。江戶時代官府主導的地域誌成爲主流，那是因統治權威的強化以及儒學思想的模仿，特別仿照中國《大明一統志》之編纂，而在一七三四年完成了《日本輿地通史》。除官方外，書寫者也有當舖商、造酒商、木材商等特定職業的家族集團，或只是純粹的個人，但個人多屬武士階級，只對政權

的移動、支配、興亡、發展有興趣，關於民間傳承、庶民生活的記錄則完全闕如。

明治時期所出現的官方地域誌，其內容包括了王政復古的經緯（復古史）、江戶史（藩史），以及明治維新之後的地域史（府縣史料）。一八七二年中央大政官下令各地編纂「皇國地誌」，但這並不是



《江戶名所圖會》，記錄鎌倉的生活景象。

地方的自主性編纂，也缺乏對地方庶民生活的描述。另外，歷史由中央政府統籌「下令」編纂時，常出現史料必須集中於中央的情況。到了一八八七年，靜岡縣縣長率先由自治體編纂靜岡縣史，這是地方行政長首次自主性決定編纂屬於自己統治區域的自治體史。一九〇一年—一一年期

間，大阪市爲了參加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也開始編纂《大阪市史》。明治四十年代（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一年）到大正初期，郡史、郡誌的編纂頗爲興盛（但後來因大正天皇即位日本正式廢郡而告終）。當時參與編纂者多爲小學老師，也包括學者，譬如曾經來台做長期原住民調查的人類學家鳥居龍藏。

從大正（一九一二年—二六年）到戰前的昭和時代，相對於以往寫史偏重「國家的、過去的、文獻的、事件的、行政的」角度，地域自治體史的編寫開始從「住民的、現在的、口述的、生活現象、生活本位的」觀點出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治體史的出版數量大幅增加，編纂過程也日趨公開，資料篇的附錄也更加詳細，自治體史的編纂也和地域史的研究緊密結合等，使得自治體史的編寫更朝普及化與專業化的路途邁進。

那麼到底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稱得上是「好的」自治體史呢？首先，文獻史料與該地的生活傳承必須是一致的。資料不是被中央政府或特定個人所獨有，或是因資料不足，只爲交差了事，而抄襲鄰近地區的自治體史。

自治體史編纂完成之後，當地住民對自治體史的理解、利用、保存等持續關懷是否還能存在？從個人到自治體，是否都能夠養成整理史料或相關文書資料的習慣

呢？也就是說，必須從日常的、樸拙的、持續的關心出發，才得以讓自治體史編纂不至淪爲學者專家的工作，或是編纂之後，自治體史成爲圖書館或儲藏室裡束之高閣的大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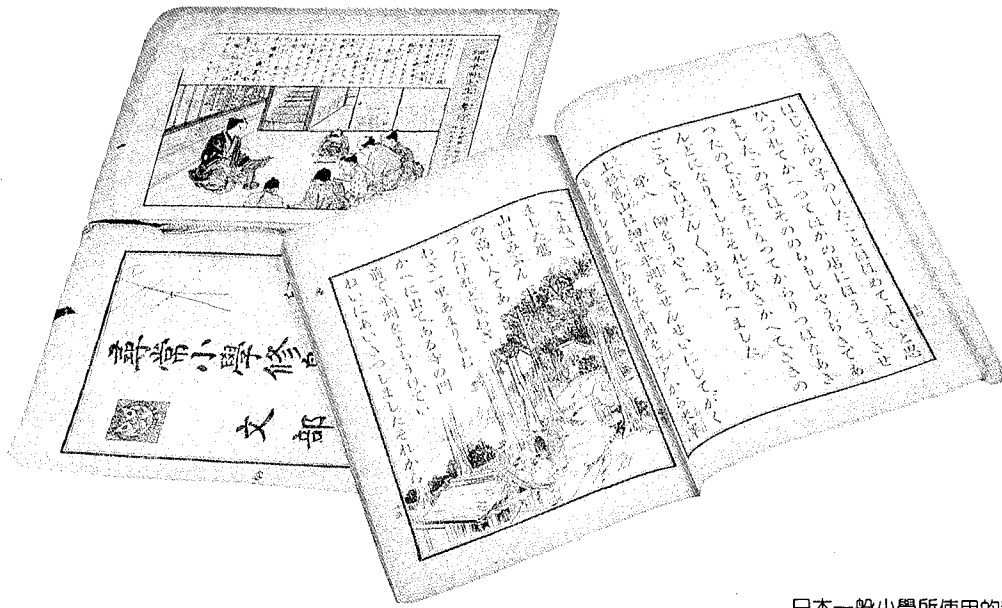
談到自治體史與當地住民的關係，近年來，爲了更貼近住民的生活，日本出現所謂大字（Oodza）史的編纂。大字是比村更小的行政單位，鼓勵大字史、村史、縣史、國史或中央史等不同主體各自編纂自治體史，其實有許多積極正面的意義。像是因編纂者對於歷史的認識不同，有記載的與沒有記載的部分自然有所出入，以及會出現對於相同事件完成不同的解釋等，這些都可以讓更多元的參與者共同趨近歷史的真貌。

學童疎開誌的編纂

日文的疎開（sokai）是指：爲了躲避空襲或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破壞，事先將都會區人口、建物較爲密集之地的住民分散到鄉村或偏遠地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國內也開始遭受盟軍的轟炸，疎開經驗成了不少都市人的共同記憶。這裡要提示的另一種史觀是透過「生活者的民衆」——也就是「疎開者的學童」他們的生活與意識，去重新梳理戰爭的歷史脈

絡。

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反省戰爭的言論與思潮早已瀰漫戰敗的日本，有所謂國民歷史學派的提倡，一九六〇年代又出現民衆史研究的熱潮。之後社會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結合發展，使得「民衆」的地位更受到學界及知識界的矚目與肯定。雖說



日本一般小學所使用的教科書。

「民衆」得到學者們的青睞，但多數史學家著眼的卻是：民衆如何被收編進入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民衆爲什麼會、以及如何會去支持這樣的體制而導致戰爭的發生？主要仍以「支配——被支配」的觀點去闡述和解釋民衆的歷史地位。學童疎開誌的研究試圖打破這種二元對立及政經取向的觀點，改而強調做爲一個「生活者」而不是「被支配者」的民衆，並從兒童個人的「私」的體驗裡，結合地方史、社會史與教育史，去窺看「公」的大歷史的脈動，然後給予戰爭時期的歷史一個嶄新的面貌。它的基本精神在於：承認這是一場起因於日本自身所發動的戰爭，強調從學童立場出發，重新審視並檢討日本在戰爭中挫敗的原因。

學童疎開誌的編纂與研究是一種「歷史學習」，這種歷史經驗也發生在英國、德國、蘇俄以及日本國內許多有過疎開經驗的城市，這裡僅以《品川學童集團疎開資料集》刊行過程爲例來說明。這是爲配合一九八五年廣島反核宣言而進行的策畫，透過學童的日記、作文、圖畫、學寮日誌、菜單、行政資料等，並從學童、老師、疎開地的百姓三者身上共同編織出不同的生活世界與心象世界，再從這些世界的交錯當中，重構被人遺忘的民衆史。

學童疎開誌的編纂在戰爭體驗的傳承、檢證上有幾項重大的意義：一、它結

合了國家史與地域史、首都都會地區與避難鄉村地區的雙向視野。二、透過疎開學童的自我檢證，包括整理、書寫與分享，正是一種歷史學習。學習瞭解戰爭體驗也是深化個人人生資質的方式之一，學習大歷史與小歷史的結合方式。三是疎開體驗者與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滲透、互相關及互相啓蒙的過程。而疎開體驗者與他們下一代之間，傳遞的是做爲「生活者」的民衆如何成爲「歷史主體」的可能。最後，戰爭體驗的發掘與傳承必須長期持續地做下去，行政自治體、地方博物館、當地住民的共同參與仍是最重要的。

地域女性史的開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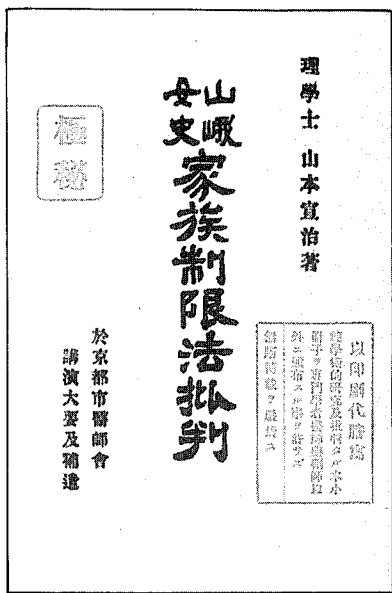
日文的「地域」是地域社會的簡稱，是指「地域社會住民的集團」。它不單只是「地理的、非中央的、鄉土的」而已，還包括生態系、文化財，以及各種特定的普遍的矛盾，它絕非靜止不動的，而是會引發各種不同抗爭的所在。「住民」的定義是指除了權力者、支配者、掠奪者、侵略者之外的人都可以稱爲住民。地域社會史研究是試圖從「國史」與「鄉土史」或「中央史」與「地方史」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中解脫出來，強調「平等、自治、和平」，重視的是支配結構與住民生活，以

及當地住民與研究者雙方的互動關係。雖然「地域住民可以做爲創造歷史的主體」此一命題是戰後日本民主化過程中極被強調的理念，但地域住民中「女性」的觀點要一直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才開始出現。

日本地域女性史的組織在一九四六年即已誕生，一九七〇年代後期開始暴增，它強調：記錄女性的生活感覺、歷史空間，以及女性與權力對峙、抗爭的歷史關係。譬如一九五九年成立的「名古屋女性史研究會」，它是從「讀書會」開始逐漸演變成「研究會」的性質，以口述歷史、書籍出版、報紙連載等方式陸續發表研究成果，主張地域女性史的目的是試圖從「家庭、行政體系、丈夫所屬的企業」當中追求自我的獨立。這些地域女性史團體也希望填補歷史的空白，或提出自己對於歷史的看法與認知。像女性參政權的實現這件事，從爲政者的角度來看，它是「國家施政史」上重要的一筆，若從女性史的立場來看，它更是做爲國家主權者一分子的女性在歷史上享有政治權利的開始。又如，斥資編纂的地方自治體史對於女性的描述通常只有寥寥數句或完全沒有著墨，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中部的愛知是以纖維產業聞名的地區；但自治體史只從產業振興的觀點來記錄，對於纖維產業的女工卻隻字未提。因此，地域女性史研究擔負的

是：還原女性在該地域史當中的位置。

可以用「女性史講座·愛媛」的發展實例，來做進一步的說明。它的前身是一九五三年創立的「近代史文庫·愛媛縣歷史教育者協議會」，當時是一個揭發反抗「教員評定、美日安保條約、學力鑑定」的組織，如教員評定是國家意識形態底下管控教育的手段，它成為當時參與的許多教師共同抗爭的目標。該講座正式創立於一九五六年，是一個鼓吹女性自覺與成長的團體，強調「在這裡生活、居住、工



山本宣治所著《山岷女史家族制限法批判》，旨在倡導女權運動。

作、學習、抗爭」，所謂的「在這裡」是指女性平常的生活世界。它的視野又不只限於愛媛這個地方，也重視對於亞洲的、世界的宏觀之追求，但主張將所有的研究成果還原到當地社會。

「女性史講座·愛媛」結集出版的地域女性史包括了《天皇制底下的公娼

制》、《昭和經濟恐慌底下的紡織女工》、《日本資本主義下的女工哀史》、《明治維新時期私人學堂的女教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女校的罷課》、《太平洋戰爭下軍需工廠的女學生》、《被動員協助參與軍國主義的婦女》等等。從這些琳瑯滿目的書名中可以發現，

它強調的是女性在「大時代」當中的變動特質，而不只是在親屬、家庭、個人層面中的故事。它凸顯的是特定職場或集團中的一群女性，而非只是單一的名女人或附屬於男性底下的小女人。最重要的這些地域女性史要挖掘的不是那些被遺忘的、女性特有的悲情或哀怨，而是去挖掘「女性與其所屬的家庭、集團如何成為地域社會「變革主體」之整體過程」。

民眾史的建構與作用

從自治體史、學童陳開誌、地域女性史三種地域史的編纂過程中可以發現，「民衆」的觀點愈來愈受到重視，民衆自身也實際參與歷史的編纂，學習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生活世界與經驗世界的歷史。重視歷史是一種能力，它可以透過學習而養成。而這裡的學習並非只是正規的知識灌輸或思想打造，而是指透過非純官方或非純學術的教育系統，由一種來自民間的、

主動的、自發的團體，提供參與者學習認識歷史並建構歷史的機會。

重視地方文化特色、強調對地方的歸屬與認同、出版地方色彩的民族誌是近十年來台灣本土化過程中蓬勃發展的一個面向，但在這片欣欣向榮的背後，卻也存在著某些問題，筆者想就民衆及地域的觀點來做一點反思。

一、從「民衆」來看，做為「生活者的民衆」這個觀點確實已受到重視，然而多數的鄉土威權主義或左派威權主義卻占據了台灣民衆發聲的立場。我們看到了許多庶民文化的「代言人」，民衆仍只居於被利用、被動員的地位，民衆的自主性與主體性似乎還沒有真正達到。

二、從「地域」來說，許多地方的文史記錄是根植於一種排他性的意識形態，或是對於對地方神話非批判性地接受，任何挑戰特定地域的觀點（無論是來自於內部或外部），都會受到來自該地擁護者的最嚴厲反擊。如要超越目前文史資料採集這種零碎記錄的方法，注入新思維是非常必要的。書寫者可以考慮「非地方因素」對地方的影響，以及地方研究如何與其他理論議題，像是社會變遷、階級、流動、權力、不平等社會科學概念相結合，譬如，把地方當成「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力再生的重要空間」這種新思維。（作者為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